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

于海根

(江苏省盐城市委党史办, 江苏 盐城 224001)*

摘要: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发生后, 处变不惊, 及时向中共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 以战略家的眼光, 率先提出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 并实现了华中党军领导和指挥的高度统一, 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中战略指挥关系问题。刘少奇对华中抗战尤其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的发展壮大, 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关键词: 刘少奇; 皖南事变; 新四军发展; 贡献

中图分类号: K26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0964(1999)03-0119-05

1941年1月25日, 也就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仅20天的时间内, 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宣告成立。作为中共中央在华中地区最高领导人的刘少奇, 为新四军军部的迅速重建及以后的发展, 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其中体现了刘少奇深邃的战略眼光, 处变不惊的胆识, 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以及果断的决策能力。

一

发生在1941年1月6日至14日的“皖南事变”是震惊中外的突发性事变。它使当时整个中国抗战前景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影。随着新四军军部蒙受巨大的损失, 以及接踵而至的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军”, 撤销新四军番号并将叶挺军长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华中形势显得异常的严峻。

皖南事变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力量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9000余人, 除2000余人突围外, 大部分壮烈牺牲或被俘。华中地区刚刚掀起并日益高涨的抗日热潮, 被国民党顽固派迎头泼了一盆冷水。更为严重的后果之一, 就是可能使千辛万

苦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破裂和解体。因此, 既要坚持抗战, 维护统一战线, 又要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就成了中共中央及新四军应变时局的主要出发点。

1941年1月14日, 毛泽东指示:“在政治上、军事上迅速准备作全面大反攻, 救援新四军, 粉碎反共高潮。”^[1]身为中共中央华中局最高领导人的刘少奇, 接到中央这一电报后, 客观地分析了华中和全国的形势, 处变不惊, 一面教育华中军队和干部“遵守党的纪律, 不轻举妄动, 不自由行动, 听候中央命令”^[2], 一面向党中央提出对付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的措施。1月15日, 刘少奇向毛泽东建议: 一, 全国局面, 国民党尚未投降, 仍继续抗战, 对共产党仍不敢分裂, 因此, 我党不宜借皖南事变与国民党分裂; 二, 我在华中实力不够, 在敌伪匪骚扰下, 要彻底消灭韩德勤顽固派甚为困难, 我部队需要休整, 根据地需要巩固, 因此, 如我对顽固派实行全面军事反攻, 对我不利, 且有极大的危险性; 三, 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 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 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刘少奇还提出了在政治上反击顽固派的具体措

* 收稿日期: 1998-10-09; 修订日期: 1999-01-28

作者简介: 于海根(1960-), 男, 江苏无锡人, 江苏省盐城市委党史办编辑, 从事新四军历史的研究。

施:一是向国民党提出严正抗议,并发表宣言,提出具体条件;二是如国民党对我提出的条件不能完全答复,即宣布在皖南事变未彻底解决前,华中我军决不再考虑北移,并宣布国民党若再向我华中进攻,即认为国民党正式与我党破裂;三是在全国全世界宣传皖南事变,揭露国民党的分裂行为,以孤立顽固派^[3]。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真考虑了当时国内外形势,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1月19日,毛泽东等指示彭德怀和刘少奇“在政治上全面揭破蒋之阴谋”,“在军事上先取防御战”。中国共产党遂在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滔天罪行的政治攻势。刘少奇提出的这一稳健的斗争策略对我党我军政治上极为有利,有效地遏止了蒋介石对华中新四军的进攻,使新四军在华中取得了休整与巩固的时间,为新四军重整旗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二

皖南事变后,重建新四军是个头等重要的任务。1月18日,刘少奇致电党中央,率先提议,为重振新四军威名,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军部,并以陈毅代理新四军军长。刘少奇这一非凡的建议,充分表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为中央及时调整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

刘少奇为何在当时提出把重建新四军军部放在苏北盐城,而不是其他地方?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盐城地区既是华中重要的战略地带,又是敌伪统治的薄弱环节,便于新四军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此重建新四军军部体现出刘少奇对华中抗战局势清醒的认识和发展壮大新四军的远见卓识。

盐城向以盛产淮盐而著称,地处宁、沪、徐、蚌侧背,是宁、沪、皖、鲁的腹地和心脏,实属连贯江南和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咽喉要道。重建军部前的盐阜区,面积达1万平方公里,人口达320万,粮食生产自给有余,棉花年产340万担以上,淮盐年产900万担,南部水网交错,北部平原广大,大运河、通榆公路纵贯南

北。在这里既可以背靠皖、鲁,凭江踞海,依赖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之利,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发展和壮大人民的力量;又可以在形势需要时西断津浦线,北阻陇海路,南截长江航道;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由东向西,配合八路军发展中原,将华北和江南连成一片。这对于坚持华中长期抗战,实现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无疑是个重要地区。

盐城在皖南事变及新四军军部重建前,还是敌伪控制极为薄弱的地区。从1940年底华中敌伪分布情况看,盐阜、淮南、淮北、津浦路东西、苏南、苏中六个大区,共有敌人61732人,伪军138152人,当时盐阜区只有敌人1460人,伪军6680人,分别占华中六大区敌伪兵力总数的1.31%和3.97%^[4]。如此少的敌伪兵力部署,对于我新四军在盐阜广阔地区开辟和建立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极为有利。

第二,刘少奇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统一华中地区党军领导,使苏北盐城已成为华中新四军事实上的政治军事指挥中心。“发展华中”是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方针。武汉失陷后,日军又对国民党实行“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把进攻的重点放在敌后解放区。蒋介石则从对外抗战转为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企图借日军屠刀消灭共产党及其抗日武装。随着华北敌占区的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所以毛泽东同志严重指出:“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5]。

武汉失守前,新四军在华中有发展游击战争的很好条件。由于项英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不执行党中央关于在华中敌后组织游击战争的指示,使我在华中发展失去了最好的时机,我党在华中没有大块根据地,新四军发展较慢,面临着被亲日派和反共派包围、孤立和击溃的危险。

1939年秋,刘少奇深入华中敌后,到达淮南,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他提出了发展华中的行动方针,号召新四军江北部队向津浦路发

展,扩大武装,建立政权。刘少奇指挥了半塔集反顽斗争,取得了胜利,在皖东、皖东北先后创建了根据地,部队发展也很快。为了使新四军有一个驰骋回旋的广大地区,刘少奇特别重视开辟苏北。1940年春,他向中央建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增援新四军。同年10月,黄克诚部队与新四军北上的陈毅部队会师苏北盐城,以盐城为中心的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标志着党中央“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的完成。

根据地建立前的华中敌后我军和党组织,开始是由江南、华北及中原各方面力量建立的,各有各的建制与领导关系,行动上政策上最初也是各干各的。在组织“发展华中”的斗争过程中,刘少奇提出一系列统一政治、军事领导的主张,在党中央的帮助下,经过艰苦努力,实现了华中我军和党组织的统一领导。

1940年8月,刘少奇向党中央建议,统一苏皖地区党军领导。不久,苏鲁豫支队、八路军新二旅和六八七团、新四军六支队和陇海南进支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归中原局领导,并开赴淮海、盐阜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同年11月,黄桥战役打开苏北局面后,刘少奇和黄克诚、陈毅在海安共商巩固华中大计。刘少奇又向党中央提议,建立统一的华中军事、政治领导机构,建议陈毅任华中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各部的总指挥,并担任中原局委员,中央很快批准了他的建议,并任命刘少奇为华中八路军、新四军总指挥部(以下简称“华指”)政委。“华指”统辖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八路军四纵队、五纵队、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等部队。“华指”的建立,实现了华中党军领导和指挥的高度统一,为新四军迅速重建军部从组织上、干部上作了准备。

在华中党军实现统一的同时,中原局(后改为华中局)的政治、军事领导机构,已陆续移到盐城。1940年11月23日,刘少奇、陈毅率“华指”与中原局机关移驻盐城。同月29日,

“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成立。同月下旬,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盐城成立。在新军部成立前,苏北盐城已事实上成为华中新四军政治、军事、文化指挥中心,为新军部在这里及时重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在刘少奇、陈毅的主持下,新四军经过两个月的统一整编,全军扩充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以更加高昂的姿态战斗在大江南北,有效地抵抗了日伪军对华中的进攻。

以刘少奇、陈毅为首的新四军新军部的建立,不仅是军部组织机构的恢复,而且是新四军阵容的更新,领导的加强。刘少奇对重建新四军作出了重大贡献,使新四军得到恢复和发展。对此,陈毅同志作了高度评价。他说:“抗战后,他到华北,华北抗日运动就有了大的发展;到皖东北,他同样开展了大的局面;到苏北也一样如此。他是代表中共中央到这里来直接指导我们的,新四军直接在中央和刘少奇领导下,我们一定会胜利的。”^[6]

在统一和加强华中政治军事领导的过程中,刘少奇的突出之举,在于创造性地解决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指挥关系问题,这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之一。刘少奇指出:“华中发展的具体道路是‘独立自主地实现三民主义与坚决武装自卫斗争’。”^[7]这就是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正确的战略,即正确的指挥关系。首先,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国家中进行的民族解放战争,它不同于欧美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中国的特殊性。敌人的强大,决定了战争的残酷性和长期性,如果没有全民族的团结就不能最终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从全国战争统一指挥看,华中被敌人分割,有广大的敌后地区,我党只有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才能影响全国抗

战形势,推动军事政治发展,这是对日战争的指挥原则。如果没有独立自主,我党在华中的游击战争就不能发展。刘少奇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发展了华中武装,才使我党我军在华中取得了领导地位。再者,从华中特定的战争环境来说,国民党阻止我军在华中发展,不断挑起反共磨擦,这使华中的抗日民族战争与内部反磨擦战争交织在一起,如我不坚持反磨擦,那么我党发展华中就是一句空话。

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毛泽东说过,一方面要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因为高度的集中指挥和游击战争的高度灵活性是正相反的东西;另一方面也要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因为就一个战区而言,游击战需与正规战相配合,就一个游击区或根据地内也需要将大大小小的游击部队互相配合作战。因此,“应该是战略的集中指挥和战役战斗的分散指挥”相结合^[8]。根据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严峻的形势和敌、伪、顽之间三角斗争的复杂局面,刘少奇把敌后游击战的一般指挥原则巧妙地运用于华中敌后战场,且强调战略上的统一指挥原则。刘少奇每到一地,总要先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并将解决方案向党中央提出建议,请党中央批准。为了取得反磨擦斗争的胜利,刘少奇提出了反磨擦游击战争的指挥原则,就是“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9]

刘少奇强调,对于反“扫荡”与反“磨擦”这两种分别与日军和顽军进行的战争,需要两套不同的战法,需要两套不同的战略战术原则。对日寇的反“扫荡”战争,应当是在战略统一指挥下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军事上以分散游击,避免决战为主,但能争取较大胜利时,应决心实施较大兵力突击。”^[10]这种军事上的分散、伏击和合击行动,必须发挥游击部队高度的灵活性和独立自主的能力。至于反“磨擦”战争,刘少奇认为,既不能采取反扫荡战争中的战略上统一与战役战术的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也不能照搬红军土地革命时期采用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方法,而应

当是在战略、战役以至战术上都要统一指挥,特别是政策上更须统一。因为与顽军的冲突磨擦既是军事斗争,又是政治斗争,是我党在统一战线内坚持独立自主的斗争,具有很强的政策性。所以,往往一场并不很大的磨擦战,打与不打,胜与败,都关系到全局,具有战略性影响。刘少奇指挥了一系列反磨擦战,并取得决定性胜利。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前后及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等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向中央的建议,都是从战略全局出发考虑的。

在华中敌后反磨擦游击战争中,刘少奇统一集中政治、军事领导,统一战略指挥,形成强大的反磨擦力量,以多次反磨擦战争的胜利,扭转了华中抗战的局面,正确地解决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指挥关系问题。这是刘少奇对新四军战略发展的又一重大贡献。

在解决华中抗日游击战争战略指挥关系中,刘少奇注意启用能人,他向中央提议陈毅负责华中军事指挥和任新四军代军长就是代表性的一例。中央多次肯定了刘少奇提议的人事安排,使华中我党我军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核心,为新四军的建设发挥了“火车头”的作用。

综上所述,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处变不惊,及时向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使新四军在华中取得了休整与巩固的时间,为新四军重整旗鼓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他以战略家的眼光,率先提出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实现了华中党军领导和指挥的高度统一,为新四军迅速重建军部从组织上、干部上作了重要准备;他在统一和加强华中政治、军事领导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解决了华中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指挥关系问题,使新四军形成强大的反磨擦力量,以多次反磨擦战役的胜利,扭转了华中抗战的局面。

参考文献

- [1]中共中央给华中局的电报(1941-01-14)[A].皖南事变资料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 343
- [2]中共中央胡服对皖南事件的沉重报告 (1941-01-15) [A] 皖南事变资料选[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345
- [3]刘少奇 关于主要应从政治上进行反攻问题向毛泽东等的建议 (1940-01-15) [A] 中央档案馆 皖南事变[C]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4 149-150
- [4]南京军区档案馆藏 新四军抗日战争历史资选编 [C] 第 43 册
- [5]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刘少奇等电报 (1940-05-05) [A] 苏北抗日根据地[M] 北京: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9 34
- [6]陈毅代军长就职演说词[A] 新四军军部在盐城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8 34-35
- [7]刘少奇选集(上)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284
- [8]毛泽东选集(第 2 卷) [C] 第 2 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435
- [9]刘少奇选集(上) [C]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286
- [10]刘少奇同志纪念馆藏 新四军文献(2) [C] 284-285.

L IU Shao-qi and the New Fourth Army in the post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years

YU Hai-gen

(The Party History Office of the CPC Committee of Yancheng City, Jiangsu Prov. Yancheng 224001, China)

Abstract L IU Shao-qi faced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with presence of mind and put forward the policy to adjust the strategy. With the insight of a strategist he was the first to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rebuilding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New Fourth Army in Yancheng, north Jiangsu to realize the high leading and commanding unity of the Party and the army in Mid China. Hence he resolved the problem of incompatibility in the strategic command in the Anti-Japanese War. L IU Shao-qi have performed indelible fea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Fourth Army and the Anti-Japanese War in Mid China.

Key words: L IU Shao-qi; Southern Anhui Incident; development of the New Fourth Army; contribution

责任编辑: 李义凡